

再创的传统：“贤妻良母”与蒙古族女子教育

包英华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010070)

摘要: “贤妻良母”是近代日本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挖掘出来,并随殖民教育逐渐波及到亚洲国家的“再创的传统”。本文通过分析“贤妻良母”话语与概念之间衍变的关系以及对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的影响,揭示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所呈现的不仅是培养了有知识的“贤妻良母”,而其背后的复杂现象,特别是出现男女分工模式的松动及婚姻规范的重塑,使蒙古族女子教育本身有了更深远的意涵。

关键词: 贤妻良母; 再创的传统; 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 G052

文献标识码: A

一、“贤妻良母”——再创的传统

“贤妻良母”是在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形容传统女性的话语。日本、中国、韩国都有类似的提法,日本将其称为“良妻贤母”,中国叫做“贤妻良母”,韩国叫做“贤母良妻”。^①这种提法表达出女性通过“相夫教子”在家庭做贤内助尽妇女之天职的特点。这种话语至今不仅影响着当代人的社会性别观,而且对社会性别的再生产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学者们回顾历史时却发现,在中国或日本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原本并没有“贤妻良母”这个合成词。^②有关“贤妻良母”合成词的起源问题,据日本学者大滨庆子^[1]的研究,日本贤妻良母术语的原型“贤母良妻”是由当时著名的洋学家兼教育家中村正直(1832—1891)提出来的。他将“贤母”、“良妻”这些传统词汇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与古代女性形象有区别的具有近代新意的“贤母良妻”这一合成词。继中村正直后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文部大臣森有礼,在国家主义的框架中把女性与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挂钩,提倡振兴女学。随后的明治20到30年代经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贤妻良母”多种提法被纳入到教育体制和政策体系中去,又通过殖民地扩张传播到东亚。台湾学者陈延媛重申,“实际上在儒教经典中并不出现‘贤妻良母’之类的词汇”,并指出“‘贤妻良母’之类的词汇,不论日本、韩国或中国,皆是在其国家力图进入近代,正摸索着脱离现状的办法之时……1900年前后‘贤妻良母’也随着宣传妇女教育口号在各国登场。”^[2]此时的“贤妻良母”与儒教的妇女观的差异在于,一方面表现在教育宗旨上,另一方面不仅批判传统的儒教女性观,并且有积极克服这种界限的意义。

通观日本“良妻贤母”、韩国“贤母良妻”以及中国“贤妻良母”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不同的国家情势带来不同的“贤妻良母”之内容,但“贤妻良母”概念的本质在于其“近代”的时代要求,“贤妻良母”印证着“近代”社会背景。

如前述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一样,在日本女性史上代表明治时期到昭和时期的女教育家下田歌子^③,目睹了欧洲诸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女性的活动之后,不仅感受到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更敏锐地注意到威胁东方的西方世界的存在。为了对抗这种威胁,下田歌子以“东方女德之美”与“西欧科学之智慧”为俩轴,不仅在日本,而是把中国和朝鲜女性都纳入到视野中并试图改变其女子教育。她所设想的全体东亚的“良妻贤母”教育是:第一,通过产业化追赶西方

的同时把女性培养成优质的劳动力；第二，铸炼“东方温顺的妇德”以对抗西方文化精神。^④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贤妻良母”被创造的深层文化根源，更值得注意的是“贤妻良母”的制造自然离不开西方背景。

面对强势的西方，后发的近代国家日本意识到培养近代化国民的迫切性和使命感，也意识到西方“把‘日本’‘东方’‘殖民地’藐视为劣势地位的权力构造的存在。”^[3]在这种权力关系运作中“被他者化的东方人‘为了西方的观众被强迫地扮演着代表者的角色’，其中特别是东方的精英分子阶层把自己当成是东方主义教义……扮演着把西方创造的意义和价值内在化了的角色。”^[4]为了跟上西方的步伐，与其说在实现男女平等、女权问题上费尽心思，毋宁说是在考虑怎样使女性为了促进和巩固近代国家体制中发挥最大作用。

因此，20世纪前半叶女性教育是以东亚知识分子对东渐的西欧列强产生危机感而兴起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东方迫不急待地增强综合力量进而跟西方较量的一种手段。其中女性的潜在在“国家”、“民族”名誉之下再一次被挖掘，并作为“女国民”，“国家之母”的“贤妻良母”被国家利用过程中再创造出来，随日本的殖民扩张传播到东亚。

这种“再创的传统”来到内蒙古应是在1903年喀喇沁旗贡桑诺尔布王（以下简称“贡王”）“聘用”日本女教师^⑤为开启，其直接传播点就在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的开端——毓正女学堂。

事实上，毓正女学堂之前，日本人派教育使者在中国领地灌输他们殖民教育的思想早有先例。如：京师大学堂和上海务本女学堂。学者们对近代女子教育中日本人的作用进行评价时谈到：女子教育作为近代学制的一部分，尤其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服部宇之吉^[5]在这个过程中对清朝起了很大的影响。上海务本女学堂当时被视为日本实践女学校的“姊妹学堂”，其真正的总教习就是日本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当年被贡王“挖走”的河原操子，军事上受福岛安正和其父河原忠^[6]的指使、教育上受下田歌子的嘱托，被派到上海务本女学堂（1902年）任教员。“下田歌子和服部宇之吉全都是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而派到中国，注重女子教育的人物”^[7]，那么河原操子也不例外，也是官方渠道派到内蒙古的一个成员。很显然，他们从事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传播日本女子教育中的“良妻贤母”思想。

二、“贤妻良母”思想对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的影响

河原操子来内蒙古执教是以官方聘用形式，为践行现代国家日本的国策，以总教习^[8]的身份开始传授日本现代知识，并在“现代知识”的文脉之下“贤妻良母”开始提倡在蒙古族女子教育中。

当时的日本、韩国与中国都面临如何加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时代课题。于是不论中国的维新派、日本的明治思想家还是韩国的开化思想家，皆欲发动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妇女参加这场竞争。他们批判旧式女教中“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谬论，提出“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从不学始”，“欲强国，必由女学”等主张，以“贤妻良母”为女学的宗旨。^[2]于是，同一时空背景下的毓正女学堂一开始也就有了批判传统儒教妇女形象的现代学堂气息。就管理女学堂一切事务的善坤夫人^⑥在其开学典礼上以批判的语气说明：“天生男女，本是并重的，中国乃惑于女子无才便是福之说，相戒不学……所以男尊女卑的势位，是由不学来的”，因此，毓正女学堂宗旨中明确规定“发达知识，健全身体，养高尚之性情，立贤良之基础”^[9]，并且，“学生必要”的条款中强调“学生均须正心励行，养成温良贞淑之女德。”^[10]在此，毓正女学堂所提倡的“立贤良之基础，养温良贞淑之女德”的意义无疑也是在批判传统妇女形象的基础上，培育受过教育并对民族有贡献的最“新式”的妇女为最终目标。

那么，塑造近代“新式”妇女形象之前，蒙古族传统游牧社会中的女性形象又如何？学界认为“汉代及以后中国北方社会妇女的地位大致上较其他中国妇女为高，并影响到武曌称帝及其后太后摄政”^[11]，并分析古代蒙古族妇女在家庭内的地位及其权力关系时谈到窥见母权制的残留。^[12]因此，“泛蒙古的祖母阿伦高娃”^[13]开始至成吉思汗的母亲及妻子直到满都海斯琴哈屯等把孤儿

培养成最终统治者的“贤母”形象主导着蒙古族传统女性话语。但在父权制的规范之下，蒙古族女性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脉络中还是被各种框框限定并强化规训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女性教育方面，虽说蒙古族古代教育始于1204年，铁木真灭奈曼部，让奈曼部的塔塔统阿给其子孙识字教书[14]，但这种脱离民众的教育，与女性无缘而持续了几个世纪。20世纪之前虽有如桑嘎热吉⑦等名门闺秀，弃荣尚文，滋养心田的片断信息，但现代规范性教育真正与平民女性相衔接的契机，始于20世纪初，以毓正女学堂为开端。

于是，毓正女学堂的规则（河原操子一手制定，由贡王翻译成汉文）中不仅加强了“贤良”、“贞淑”等修身教育，在课程设置中还出现了与男子普识课有所不同的“家政、裁缝、手工”等家事科内容。随后1907年，清政府的学部颁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家事科被定为主要课程[15]，以便使女子拥有足够的的能力维持“家庭”，把家庭看做是民族、国家的基础，通过家庭这种间接方式来贡献民族、国家。

当时，在贡王府开设的崇正学堂、守正学堂和毓正女学堂执教的日本教官伊藤柳太郎、吉原次郎和河原操子等人，从军事和教育双重任务出发，考虑到“蒙古的地域不仅是清国的藩属，也是东亚的一大长城，蒙古的盛衰直接关系到东亚全局的盛衰…像这样（民族的）女子更应享有文明的新教育”[16]，于是，苦心制定学堂最初的章程、教程，以“完全日本式”[17]或“日本的分校”形式[18]传播现代知识。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贤妻良母”，即培养有教养、有知识的女性，使她们承担起家庭里所有的家务和管教孩子的责任，因此，当时的女子教育致力于家事科教育。

由此，1903年的毓正女学堂成为“贤妻良母”思想在塞外蒙古的初期传播点（虽然这个女学堂没维持多长时间），后续的1937年开设的兴安女学院，则从学校命名到教学目的都明确了培养“贤妻良母”的思想。

据当年“蒙古新报”第21号上的日文标题为“在蒙古已临近设立‘花嫁学校’（日语，意思是新娘子学校）”，而蒙语标题为“兴安警备军所做的美事——已临近开设蒙旗女学院”的新闻报道中讲到：对于蒙古族青年来说从技艺、才能及文化方面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只是妇女们的教育实在不全面，……因此，兴安南省警备军的策略是为了培养蒙古青年理想中的女性，全部官员商定之后决定在蒙旗开设女学院。女学院招收的对象及目标是“必须是小学毕业并智力健全的未婚女子为入学对象……成为辅助新时代青年的内贤助，帮助这些青年努力奋斗。”[19]后来校名改为兴安女学院，但办学宗旨仍然是“为蒙古军官、官员培养有文化教养的”贤妻良母。教学内容中除了算数、蒙语文、日语文等文化课之外，还增加了裁缝、编织、烹调和文明礼仪等技艺课。

对于日本统治时期“贤妻良母”的倡导及特征方面，台湾中央研究院游鉴明博士认为“近代以来，台湾、朝鲜、中国东北相继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贤妻良母’在殖民地广泛倡导与推行时，又被注入了浓厚的殖民统治色彩”，“早期女子教育的内涵即强调插花，裁缝等课程，教育女学生如何成为贤妻良母”。[20]刘晶辉则提出“在中国东北沦陷时期‘贤妻良母’主义的倡导与推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和现实生活中，一直是属于占压倒优势的‘正统思想’。而且还被日伪当局根据统治的需要，赋予了新的内涵……‘贤妻良母’主义成了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对被殖民地区人民实行统治的工具。”[21]

兴安女学院成为当时日本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不排除其目的“培养为日本殖民者、伪政权服务的各种人材。更直接更现实的目标，则是为了给其伪军政官吏培养有文化知识、懂得礼仪、会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22]，当时社会也公开认可“兴安女学院（后变为兴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搭配军官学校，是军官太太养成所”，所以，那个年代入校的女学生难免被冠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并且被认定做有知识的贤妻良母是她们的天职，这固然反映了当时的政局和思潮走向。

比起先前的毓正女学堂，兴安女学院从教学宗旨上更加明确了培养“贤妻良母”的目的，显现出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规范性特征。接下来的“西苏尼特女学校”（1941年开设的西苏尼特旗女子家政实验学校），把蒙古族“贤妻良母”的内容从“成熟期”推向“再编期”。

关于 1941 年“西苏尼特女学校”创建的消息，据当时财团法人善隣协会经营的《蒙古》杂志上的报道：在锡盟公署西苏尼特，针对管辖内的蒙（古）民（族）女子，开设了蒙古高等女学校。校舍是运用适合沙漠学校的大型蒙古包。尽力以诸如日语、日本的现状报告让她们理解东亚盟主的日本，并以蒙古历来的习俗为基础，让她们领会草原之妇道。[23]同样是殖民时期的内蒙古，与东部女子教育中实施的以顺从为特征，要求妇女“以妇德涵养为着眼点”，“勤劳奉仕”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相比，西苏尼特女学校出现了特有的游牧文化气息。学习科目中除文化课之外，还学习家政、卫生、裁缝及乳制品制作、毛皮加工、蔬菜种植等实用技术[24]，而且这个时期出现了第一本针对蒙古族女性的教科书——《使乃家庭昌盛之书》。⑧这本教科书围绕“男主外、女主内”、“各司其职”思想，系统讲授了现代游牧生产生活知识及营养学、卫生学等科学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对如何培养“贤妻良母”这一议题，在“妻子三大任务”章节中，从“相夫”、“教子”、“贤惠”等三方面做了详细解析。[25]为家庭昌盛之目的，自始至终把家庭与妇女联系在一起的蒙古族女子教育，这时已打破传统家庭思想，家庭成为国家及民族兴旺之源泉。虽然女性对所发生的事情并不完全意识到，但恰恰体现了那个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女子教育所背负的特征。

三、“贤妻良母”教育背后的社会重组

如果说，女性是社会的晴雨表，综观 20 世纪前半叶蒙古族女子教育，虽核心问题是培育有知识的“贤妻良母”，但不能忽略其客观上促使社会重组现象的发生。社会重组包括对管理群体成员资格、亲属关系、家庭组织、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社会结构的规范与安排的更改、增补和排除。[26]下面围绕社会重组至关重要的性别分工、婚姻规范的重组方面来探讨蒙古族“贤妻良母”教育所带来的影响。

首先，男女分工模式出现松动现象。研究社会性别方面的学者在讨论女性与社会变迁问题时，往往认为“无论什么时候，当深刻的社会变化发生时，当整个社会似乎受到威胁时，女人就会被‘邀请’去积极参加公共生活，这几乎是一条规律了。一直以来，女人的力量在帮助建立男性统治时都会受到欢迎，而女人也常常很高兴地承担这样的角色。”[27]对于 20 世纪前半叶蒙古族女性来说，整个民族面临危机时刻无论她们高兴与否，“邀请”她们去参加公共领域——接受学校教育是既定事实。而且以这种“规训”方式来驯化身体从而完成改造灵魂的任务的主导者⑨是男性。自从贡王提倡的“民族之振兴，有赖于民众之文化提高，而民众文化之提高，则有赖于母教之水平”的女子教育到 20 世纪 30 年代文化人士所提倡“受教育母者，才能培育出健壮的幼儿，健壮的幼儿依其教育才能创出大业”[28]，为了培育健壮的民众而重视女子教育再到 40 年代第一本蒙古族女子教科书《使乃家庭昌盛之书》的问世为止，蒙古族王公贵族、有识之士提倡的女子教育没有离其宗，就是为家庭的昌盛培养有知识的“贤妻良母”。于是，女子教育内容一开始就与男子有所不同的“家事科”被重视起来。如：1903 年跟随河原操子接触现代知识的毓正女学堂学生最喜欢技艺课，特别是“像精巧编物课每个年级都很愉快地进行”[29]，并把这种技艺展现在当年日俄战争时期。[30]学生们不仅愉快地接受家事科教育，而且 1906 年随河原操子到日本留学的三名蒙古女留学生：于保贞、何惠贞、金淑贞齐入日本实践女学校，所学的都是造花和编物等技艺专业。到了 1937 年，兴安女学院的学生们虽认为“贤妻良母”教育在蒙古族社会从来没有过的，是日本妇女在婚前接受文明礼仪、待人接物等有关知识的教育。[31]这里学习家事课被认为是将来做“贤妻良母”的预习课，“贤妻良母”一时视为“奴化”教育的手段来被否定。但客观上她们学到了一些待人接物的社会知识，要常洗澡、讲卫生，说话要文明、有礼貌等文明行为。1941 年的西苏尼特女学校，更是把“家事科”放到首要位置，从而可以洞察出 20 世纪前半叶“贤妻良母”规范性教育对蒙古族女性带来的影响。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女子教育最终成效与男士们所提倡的女子教育初衷相背离，受教育的女性并未完全按男士们的意愿回归家庭。从毓正女学堂迈出国门的于保贞，1912 年回国并担当着喀喇沁王府崇正学堂（生徒三百余名）的日语教师[32]；兴安女学院第一期毕业生，李淑芝、包明珠、王秀贞等东渡留学日本；王贵贞任小学教师；赵长平、包瑞兰等当了助产士[33]等等社会现象的出现，足已说明受教育的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走上社会，发挥其潜能，使男女铁板一块的分工模式松动。

接受教育的女性多种需求的端倪，令最初提倡女子教育的男士们出乎意料，终使让他们惊叹：“呜呼，女人的德怎么会变成这样？”^[34]

其次，婚姻规范的重组。传统社会往往是在家族这样的私人领域里通过“交换女人”^⑩来解决婚姻问题，但近代因社会机构，即学校和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无论是1903年还是1937年或1941年，每一时段的女子学校规定“哪些人有资格享受教育权利？”时，毫无疑问首先限定的是“未婚女性”，并且学校形成校长或当地札萨克（旗长）监督的森严的管理体系。正是学校的“包括”与“排除”规则，使以知识来搭桥的女子学校俨然成为女子婚前的“修炼地”或“婚姻介绍所”，如：兴安女学院，不仅在课堂上安排女学生跟年轻军官相亲，有不少人毕业后嫁给青年军官，也有不少男性把女子学校当成择偶的场域。

在传统社会以家族私人领域解决的婚姻问题，到了近代特别是女子学校的相继出现，加速了把私人问题转成公共论述的情形，这也是近代中国舆论界构成的一种特色，其中婚恋问题的讨论，最为复杂。^[35]虽然这时的蒙古族社会性别议题的公私界限也似乎被模糊，但“男性凝视”下女性居于“观看”的位置没有根本的改变，女子学校也给社会提供“看”或“被看”的机会。如果婚姻规范的重组是权力的展现，对近代蒙古族“贤妻良母”教育来说，支配身体到心灵的权力，不完全是殖民与抗衡的一种战略，而是父权或男权支配的一种展现，其中女性潜在的帮助不容小觑。

综括来说，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是以东亚知识分子对西欧列强产生危机感而增强综合国力，对抗列强的产物，并通过日本人的直接传播移植到内蒙古的“贤妻良母”思想是“再创的传统”。因受时空背景影响，这种“再创的传统”站在救亡图存、强种保族的宏大叙述下，成为规范女子回归家庭的一个踏板、一块敲门砖。但受教育的女子出现在公共场所并发挥其潜能时，女子教育的成效不仅仅是培养了有知识的“贤妻良母”，其背后的复杂现象，特别是出现男女分工模式的松动及婚姻规范的重组，使蒙古族女子教育的意涵有了很大的诠释空间，这也是研究这个议题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滨庆子的《“贤妻良母”与近代日本女权主义和陈娅濠的东亚贤妻良母论——再创的传统》等著作中提到这些说法。

②日本学者大滨庆子和台湾学者陈娅濠在其著作中详细分析了这一问题。

③下田歌子在1893年至1895年，为日本皇家教育到英国等欧洲诸国考察。

④见日本陈娅濠的《东亚贤妻良母论——再创的传统》（日语版，劲草书房，2006。117页）。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从1902年到1909年滞留7年的服部宇之吉在中国滞留时正是近代教育制度的正规引进时期，开设试验性的京师大学堂的清朝政府，把教育行政的实务以及担当近代教科的教员往外派遣之事依赖于日本，当时不仅是女子教育，中国的整个教育正在完善近代的学制时期。所谓的“日本人总教习”或“日本教习”是指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的诸学堂里以教务顾问或教师身份活动在教育行政或学校教育各个领域的日本人。这种教习的数目在鼎盛时期达到数百人，在中国教育史上已达到被称为“日本教习时代”的程度。他们被聘用的形式有两种，就像陈娅濠的著作《东亚的良妻贤母论——再创的传统》（日语版）书里分析一样，在当时京师大学堂执教的服部宇之吉和本论文所提到的河原操子都是通过政府机关被官方雇用的，还有一种是以民间团体作为媒介通过私下契约个人雇用一种。无论官雇或私雇，为了培养教育事业上协力辅佐的人材的原因，中国是以日本作为模型谋求教育的现代化，而接受方日本作为现代国家国策向大陆派遣教习及顾问，以备携手合作应对欧美列强。

⑤见日本山崎朋子的《东亚女性交流史》（日语版，1995年）。依据日本学者山崎朋子的分析，河原操子入蒙之前“虽有几个日本军人在蒙古极其短暂的停留过，但一直没寻找到长住蒙古的机会，多亏喀喇沁王提出聘用日本教师这一事……使日本人入住蒙古被正式允许，这对日本政府以及军部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与其说给被选中的河原操子派军事任务，还不如说，正因为不得不背负这样秘密任务而从事女子教育工作，河原操子才被选中”，其后

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为结局，证实了这一看法。在山崎朋子手里保存的当年良妻贤母主义标榜之大日本女学会发行的启蒙杂志“女性”，1905年10月号上刊登着照片版的毓正女学堂叫水仙的学生的一封信。信中极其真诚的表达了学生们“为了东洋而亲手制作的编织物”交给日本“叔叔和伯伯们”的心情。于是，卷末还附上介绍这封信的记事：这些所谓的编织物是用毛线做成的荷包，共55件，里边还放着蒙古少女们的慰问信。接受这些物品的日本妇女新闻社，把这些编织物送到东京不久（日俄）战争已结束，为了不让少女们的盛情落空，充作内地伤病军人的慰问品来用。

⑥见日本河原操子的《蒙古土产》（日语版，实业之日本社，1909年）。善坤夫人的演讲是：“天生男女，本是并重的，中国乃惑于女子无才便福之说，相戒不学…各国的兴盛蒙古之衰弱，正在学与不学内分出，要讲女子的学问，很要紧呢，大凡作妇后，料理家务，教训子女，那一件不用学问呢，若讲各国女子的学问，无所不学，就是咱们这里，男子尚且多有不如的呢，这一时讲也不能讲许多，总之文字是各样学问的根本，行动坐卧言语，又是女子的最要紧的事，先把这两样学好，再分门类学去，各国女子所能的，咱们就能了。”因不学而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衰弱的蒙古，因不学而落后于先进国家女子的蒙古男人们，因不学而落后于男子的蒙古女人们等多方面列举，重视教育平等。

⑦桑嘎热吉是元朝贵族女性。引自特古斯巴雅尔教授主讲（2008.10.16下午在内蒙古大学主楼324教室进行）的蒙古族藏书简史学术报告。

⑧这本教科书由日本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赛春嘎执笔撰写，后把名字改为那·赛音朝克图，《那·赛音朝克图全集（6）》之《使乃家庭昌盛之书》（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基本上受福柯的影响。见游鉴明《运动场内外——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⑩列维·施特劳斯提出来的“交换女人”概念，由美国学者盖尔·卢宾借来说明了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存在。见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参考文献

- [1] 大滨庆子. “贤妻良母”与近代日本女权主义[J]. 中国女性文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3).
- [2] 陈姪媛. 简介近代亚洲的“贤妻良母”思想——从回顾日本、韩国、中国的研究成果谈起[A].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0) [C]. 台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2. 12.
- [3] [日本]北村文. 日本女性在哪里——印象及认同的政治[M]. 日语版, 劲草书房, 2009. 10.
- [4] [日本]北村文. 日本女性在哪里——印象及认同的政治[M]. 日语版, 劲草书房, 2009. 11.
- [5] [日本]陈姪媛. 东亚贤妻良母论——再创的传统[M]. 日语版, 劲草书房, 2006. 100.
- [6] [日本]福岛贞子. 日俄战争秘史中的河原操子[M]. 日语版, 妇女新闻社发行, 1992. 5-6.
- [7] [日本]陈姪媛. 东亚贤妻良母论——再创的传统[M]. 日语版, 劲草书房, 2006. 116-117.
- [8] [日本]陈姪媛. 东亚贤妻良母论——再创的传统[M]. 日语版, 劲草书房, 2006. 120.
- [9] [日本]河原操子. 蒙古土产[M]. 日语版. 实业之日本社, 1909. 149.
- [10] [日本]河原操子. 蒙古土产[M]. 日语版. 实业之日本社, 1909. 155.
- [11] 杨联陞. 中国历史上的女主[A]. 邓小南, 王政, 游鉴明主编. 中国妇女史读本[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2] [日本]青木富太郎. 古代蒙古妇女在家庭内的地位及权力[M]. 日语版. 游牧社会史探究. 8册.
- [13] 策·达莱. 大蒙古国[M]. 蒙古文,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0.

- [14]元史[M].列传第十一.塔塔统阿传.
- [15]杉本史子.由20年代中国的家事科教育来看女性角色观念的转变[J].中国女性文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3).
- [16][日本]河原操子.蒙古土产[M].日语版.实业之日本社,1909.144-148.
- [17][日本]横田素子.崇正学堂与伊藤柳太郎[M].日语版,第9号,中日文化研究所所报,2010,(12).
- [18][日本]山崎朋子.东亚女性交流史[M].日语版,1995.79.
- [19]蒙古新报[N].蒙古文.康德四年,第21号,1937,(6).
- [20]刘晶辉.民族、性别与阶层——伪满时期的“王道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16.
- [21]刘晶辉.民族、性别与阶层——伪满时期的“王道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16-217.
- [22]格日乐图.蒙受奴化教育险丧生命[A].索布多主编.兴安女高[C].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103.
- [23]蒙古[M].日语版,第八卷第九号,昭和十六年下,1941.139.
- [24]金海.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115.
- [25]那·赛音朝克图.使乃家庭昌盛之书[A].那·赛音朝克图全集(6)[C].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397.
- [26]乔安妮·内格尔, C·马修·斯尼普.民族重组:美国印第安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存战略[A].刘精香译,见何群编著.土著民族与小民族生存发展问题研究[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 [27]克内则威克.情感的民族主义[A].陈顺馨 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45.
- [28]贺也札布.妇女教育及众人之会[N].蒙古报,伪满州国蒙政部总务司调查科,1934.
- [29][日本]河原操子.蒙古土产[M].日语版,实业之日本社,1909.158.
- [30][日本]山崎朋子.东亚女性交流史[M].日语版,1995.79-80.
- [31]索布多.回顾兴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建校与发展的历程[A].索布多主编.兴安女高[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2.
- [32][日本]横田素子.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蒙古留学生[A].日语版,和光大学综合文化研究年报[C].2009,蒙古学术交流会06.
- [33]王贵贞.兴安女高的由来[A].索布多主编.兴安女高[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 [34]无名作者.妇人之德[N].蒙古报,蒙古文,19号,1935.
- [35]游监明.运动场内外——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378.

Recreated Tradition: Image of "Dutiful Wife and Loving Mother" and the Child Education of Mongols

BAO Ying-hua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70)

Abstract: The image of "Dutiful Wife and Loving Mother" is part of the tradition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making of the Japanese nation and recreated along with the spread of colonial education to Asian countries. By analyzing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course of "Dutiful Wife and Loving Mother" and the concept itself,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the child education of Mongols children in modern time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child education of Mongols not only has the feature of training educated "Dutiful Wife and Loving Mother", but also reveals the complicated reasons for it, especially the relaxed labor division of men and wome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rriage norms. Therefore, the outcomes of the research favor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child education of Mongols itself.

Key words: Image of Dutiful Wife and Loving Mother; recreated tradition; child education of Mongols in modern times

收稿日期: 2013-05-17;

作者简介: 包英华(1971-),女,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性别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社会与发展研究。